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虚拟化及经济波动

李腊生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虚拟化

通常情况下,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是国民收入增长率或GDP增长率或GNP增长率。^①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是指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经济国力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出不一致的经济现象。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在高速度下,各个时期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见表1。

表1 国民收入及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时期	国民收入 平均增长率	居民消费水平 平均增长率
“一·五”时期	8.9	4.2
“二·五”时期	-3.1	-3.3
1963-1965年	14.7	8.6
“三·五”时期	8.3	2.2
“四·五”时期	5.5	2.1
“五·五”时期	6.1	4.8
“六·五”时期	10.0	8.6
“七·五”时期	7.6	3.6
1991-1993	12.4	9.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281页;《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12、49页。

除“二·五”时期出现-3.1%以外,其余各个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均保持在5.5%之上,至于“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什么会出现负值,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即“大跃进”的影响所致。总体上看,1953~1993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达7.2%,改革开放十五年的1979~1993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9.2%。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却处在2~3左右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也只在4~5%左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均是较高的。

我国的高速度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它到底是福还是祸?我认为,从高速增长背后的实际经济结果可以看得更清楚。

首先,如果说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特指我国)是福的话,并且将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视为主要经济目标,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又将如何解释。从表1可以看到,“文革”期间的“三·五”时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8.3%，“四·五”时期也达到5.5%，十年平均为6.9%。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经比,6.9%的速度是相当高的了,即使是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速度也不过9%左右,“文革”期间的经济增长速

度虽不及9%，但距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速度也仅仅只相差2个百分点。如果说，速度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主要指标，是刻划经济成就的最重要标准的话，那么，仅从速度上看，“文革”期间的经济成就就应该是巨大的，即使是没有进入起飞阶段，至少也应该是进入了“跑步阶段”，这显然与事实相矛盾。我以为，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我们的高速度并非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高速度，在我们高速度的背后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虚拟化。

其次，以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来看我国的高速度。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各时期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情况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增长较快的时期分别是，1991~1993年、1963~1965年、

“六·五”时期、“五·五”时期和“一·五”时期。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相比，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率在所有时期均小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这种格局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84~1987年，美国GDP平均增长了3.30%，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却平均增长了3.57%；1965~1989年，日本GDP平均增长了5.76%，同期居民的消费水平却增长了8.05%。即便是就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相比，也不难发现，各不同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除去“二·五”时期不谈（因为“二·五”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为负数），“六·五”时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率之差为1.4%，而“三·五”时期却高达6.1%，其余各期基本保持在3%以上。这种状况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绝大多数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没有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很显然，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之间的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增长存在虚拟化。当这种差距愈大，经济增长的虚拟

化程度就愈严重。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五·五”和“六·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是较为健康的，除此以外，我国的经济增长均存在较为严重的虚拟化。如果仅此还不具说服力的话，只要我们再次观察“文革”期间的情况，事实就清楚了。“三·五”时期，国民收入平均8.3%的增长速度算是够高的，可是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平均仅增长了2.2%，还小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2.7%的水平，“四·五”时期也是这种状况，说明“文革”期间，虽然经济增长保持了高速度，但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明显的降低。^④这种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高速度不是虚拟化的速度还能是什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经济增长同时伴有通货膨胀，则经济增长虚拟化将会更为严重。

二、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的原因剖析

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过份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生产几乎完全偏离了它自身的目的，从而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局面，结果是经济结构长期在极度不协调的状态下运行。我以为，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虚拟化的最直接的经济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经济体制与其相应的管理体制。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假定社会消费组织仅由企业和居民两个集团组成，同时假定企业是生产资料的唯一消费者，居民则是消费资料的唯一消费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利益，加上产品交换过程中的产品经济特性，使得企业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不仅表现为你生产什么，我消费什么（封闭经济），而且还表现为你生产什么

我浪费什么，结果使产业或产品结构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扭曲，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封闭式循环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重工业能在不顾及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水平，在长时间内保持超高速增长的原因。1952~1978年，我国农业产出水平增长了不到1倍，轻工业增长了9倍，而重工业却增长了近28倍。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循环所带来的速度即为虚拟化的速度。显然，这种现象愈严重，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的程度就愈大。有关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假设的实例得到说明：如果世界完全和平了，生产武器就没有任何实际经济意义，假如某国的生产结构是，非武器生产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占9/10，武器生产占1/10，到了下一年，非武器生产部门的产出不变，而武器生产却翻了一番，结果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也能高达10%。仅从国民经济增长率10%的数量上看，经济成就是显著的，殊不知，实际经济状态根本就没有任何进步，相反还会因武器生产的迅速扩张而挤占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至少有10%的虚拟化。

从理论上分析，社会总需求（供给）由生产资料需求（供给）和消费资料需求（供给）构成。令 D_1 表示生产资料需求量， D_2 表示消费资料需求量， D 代表总需求， S 表示相应的供给，则有：

$$D = D_1 + D_2 \quad (1)$$

$$S = S_1 + S_2 \quad (2)$$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盈亏均由国家承担，企业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意味着企业生产在客观上允许浪费，从而使得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具有无限弹性， $D_1 = \infty$ ，由(1)式知，即 $D = \infty$ 。这说明，在这种经济运行体制下，无论如何，永远都有 $S < D$ （因为 S 总是有限的），总供给永远小于总需求，短缺经济成为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如果社会生

产没有资源约束的话，只要忽视 S_2 的扩张，经济增长虚拟化程度可以达到无限大，我国的大跃进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1958年，国民经济增长率高达22.0%，居民消费水平仅增长1.4%，两者相差竟达到20.6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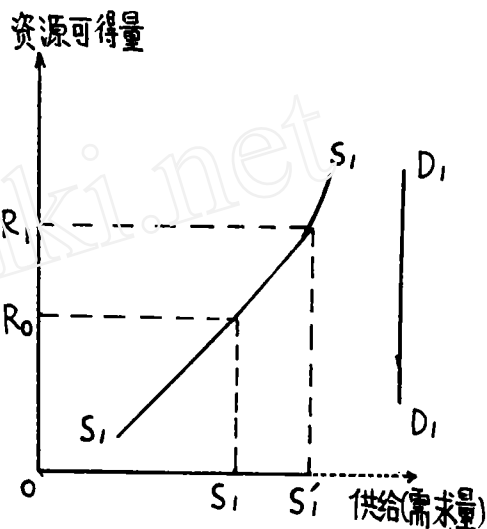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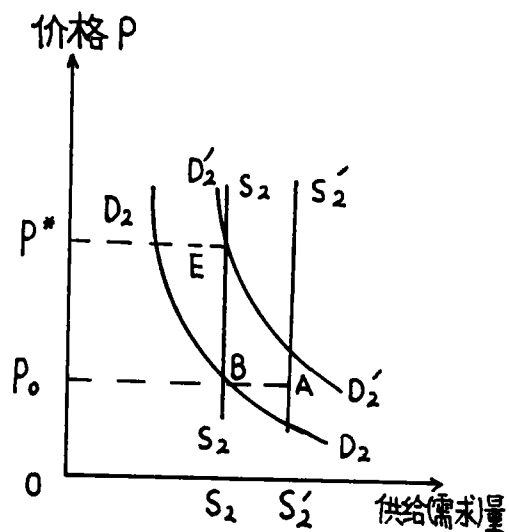


图 2

虽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总量短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短缺现象也并不一定肯定会产生经济增长速度的虚拟化。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的虚拟化是由结构性短缺的形态所引起的，见图 1、2。假设社会经济活动仅由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组成，图 1 表明了生产资料市场的运动状况，图 2 刻划了消费资料市场的运动状况。在图 1 的生产资料市场中，交易双方均为企业，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可以假设企业对价格变化不作出反映。又因为 $D_1 = \infty$ ，因此，生产资料需求曲线在图 1 中表现为一条无限远处的与横轴垂直的直线 D_1D_1 ， D_1D_1 就是一个不变的量，图 1 中的供给曲线则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 S_1S_1 ，既然 S_1S_1 与价格无关，因此，唯一引起 S_1S_1 变动的因素就是资源可得量。从图 1 可以看出，曲线 S_1S_1 与 D_1D_1 永远也不会相交，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市场不可能实现均衡。而在图 2 的消费资料市场中，交易一方是企业，另一方是居民，显然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受价格影响的，并且价格是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故此，消费资料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D_2D_2 ，由于 D_2D_2 受收入水平的约束，因此为有限量。相反消费资料的供给方——企业对价格变化没有反映，其供给曲线 S_2S_2 则在图 2 中表现为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在现行价格水平 P_0 下，则消费资料市场表现为需求过剩，或者说供给不足，其差距为 AB。从图 2 可以看出：消费资料市场要实现均衡，可以有两途径。一是提高消费资料的价格，使价格水平由 P_0 上升到 P^* ；二是扩大消费资料的供给水平，使供给曲线向右方移动，譬如从 S_2S_2 移到 $S_2'S_2'$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能使消费资料市场实现均衡，但两种途径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无疑意味着居民购买力的价值损失，其量为 AB 之距离。另外，由

于提价，同时有可能伴随居民收入的上涨，若居民收入水平与价格同比例上涨，图中消费资料的价格从 P_0 上升到 P^* ，但同时需求曲线 D_2D_2 也会发生向右上方移动，从 D_2D_2 移动到 $D_2'D_2'$ ，结果在价格 P^* 下，市场均衡仍不能实现。从图 2 可以看出，由于供给方对价格不敏感，如果价格上升的同时，不能伴随供给曲线的移动，即使这种调整行为能使消费资料市场实现均衡，那么这种均衡也是以降低居民消费水平为代价的，可以将其视为萎缩性均衡。从动态的角度确切地说，是一种凝固性均衡，因为一旦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又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供给却不作出任何反映，下一轮又只能依靠提价的方式来达到均衡。这样一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会愈来愈恶化。只要消费资料市场的运动保持这种形态，国民经济的任何增长都是虚拟化的。相反，若消费资料市场的调整采取的是后一种途径，则经济增长就不会出现虚拟化。因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首先是保证了消费资料市场的均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从消费资料供给的增长中（即从 S_2S_2 上升到 $S_2'S_2'$ ）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从图 2 明显能看出，新的均衡点 A 是比 E 更高级的均衡，国民经济的这样一种运动过程才是健康的发展。可惜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长期忽视对 S_2 的调整，经济增长的实践实际存在着严重的虚拟化。

此外，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错误观点，即有关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我国政府与经济学界中，长期存在着放弃眼前利益是为了使长远利益更大化的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只要将图 1 和图 2 结合起来观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图 1 中， D_1 是个无底洞，你再怎么放弃 S_2 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例如社会资源从

R_0 增加到 R_1 ，如果将资源的增量 $R_1 - R_0$ 用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图 2 中则可使 S_2S_2' 移到 S_3S_3' ，实现消费资料市场的均衡，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么做，放弃眼前利益，将资源的增量 $R_1 - R_0$ 全部用于生产资料市场，结果生产资料的供给从 S_1 增加到 S_1' ，生产资料市场同样没有任何改善， S_1' 照样离 D_1 无限远。很显然，这一结果只是加大了经济增长的虚拟化程度，长远利益不知从何而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一直以牺牲眼前利益为代价，其目的试图能换取长远利益的更大增加，实践的结果表明，我们根本就没有从牺牲眼前利益中获得一点点长远利益，相反，眼前利益却作了毫无实际意义的牺牲。要不是改革开放，尤其是“五·五”后期和“六·五”时期我们放弃了这种指导思想，可以想象，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现在远达不到目前既有的水平。

引起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这决定着迅速摆脱贫困是政府所面临的极其重大的任务。从客观上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存在追求高速度的冲动，只有当这冲动与公有制和集权的管理体制相结合时，经济增长虚拟化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或政府拥有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权，政府可以根据追求高速度的需要来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当经济效率的衡量在技术上变得复杂和困难时，追求速度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重要的经济目标，公有制成为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客观物质基础。在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实践证明，政府几乎不可能安排好各部门乃至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尤其是在没有市场信号的情况下，政府对资源的分配缺乏客观依据，不可避免地带有人为的作用，结果使产业结

构或产品结构只能在不协调的状态下运行，经济增长出现虚拟化。在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只要政府有追求高速度的冲动，这种冲动就能极其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化作实际行动，而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将速度问题提高到如此重要的程度，速度成为考核政绩或业绩的唯一经济指标，集权的管理体制在利益上表现为“官本位”，这就必然使经济行为表现为，哪怕是牺牲经济效率，为了速度也在所不惜，甚至出现虚报和假报的现象。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讲，速度指标也易于达到，数量的扩张就可以解决，相比之下，效率指标的提高就显得困难得多，并且还存在着失败的风险。在企业经营者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出于对自身的保护，或追求“升官”效用，自然就会选择前者，结果使国民经济在低效率下运行，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高速度、低效率。经济增长高速度、低效率的运行模式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虚拟化。

三、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与经济波动

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从逻辑上分析，经济增长虚拟化必然导致经济波动加剧，引起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因为虚拟化的速度是毫无实际经济意义的速度，这种速度是靠浪费和牺牲经济资源而实现的，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速度不能长期维持着高水平，一旦它达到一定程度，收缩或衰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追求高速度的政府又不能忍受低速度，强烈的扩张又重新开始。

1960~1989年，中、美、日、韩四国的

GDP 增长情况如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 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通过对四国经济增长的运动状况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 我国的经济周期又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见表 3。

表 2 1960~1989 年中、美、日、韩 GDP 增长率(%)

年份	中国 ^①	美国	日本	韩国
1960	-1.4	2.2	13.3	1.2
1961	-29.7	2.6	14.5	5.8
1962	-6.5	5.2	7.0	2.1
1963	10.7	4.1	10.5	9.1
1964	16.5	5.3	13.1	9.7
1965	17.0	5.8	17.3	5.7
1966	17.0	5.9	10.5	12.2
1967	-7.2	2.9	10.4	5.9
1968	-6.5	4.1	12.5	11.3
1969	19.3	2.5	12.1	22.0
1970	23.3	-0.3	9.5	12.0
1971	7.0	2.9	4.3	9.2
1972	2.9	4.7	8.5	5.9
1973	8.3	4.9	7.9	14.4
1974	1.1	-0.7	-1.4	7.9
1975	8.3	-1.0	2.7	6.5
1976	-2.7	4.8	4.8	13.2
1977	7.8	4.6	5.3	10.9
1978	12.3	5.2	5.2	10.9
1979	7.0	2.1	5.3	7.4
1980	6.4	-0.2	4.3	-3.0
1981	4.9	2.0	3.7	7.4
1982	8.2	-2.5	3.1	5.7
1983	10.0	3.7	3.2	10.9
1984	13.6	6.6	5.1	8.6
1985	13.5	3.0	4.7	5.4
1986	7.7	3.8	2.5	11.7
1987	10.2	3.1	4.4	11.1
1988	11.3	4.6	5.9	11.3
1989	3.7	3.0	4.9	6.7

资料来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1990), 第 27、29 页。

注:①国民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 第 35 页。

表 3 中、美、日、韩经济波动情况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1960~1989 年 GDP 平均增长率 (%)	5.9 ^③	3.1	7.1	10.3
经济周期的次数 (谷底至谷底)	7 ^①	6 ^②	5 ^③	4 ^④
平均持续的时间 (年)	4.0	4.8	4.8	6.3
最大扩张波幅 (%) ^⑤	25.8	6.2	4.2	10.7
最大收缩波幅 (%) ^⑥	-28.3	-5.6	-9.3	-10.4
总的离散系数 (%) ^⑦	163.15	71.16	59.75	46.31

注:①从 1961~1989; ②1960~1989 年; ③1962~1986 年; ④1960~1985 年; ⑤为国民收入; ⑥相邻两年经济增长率之落差; ⑦指观测值与平均值的偏离程度, 计算公式为 $\eta = \frac{\sigma}{\bar{y}} \times 100\%$, 其中: η 为离散系数, σ 为标准差, \bar{y} 为 GDP 平均增长率。

从表 3 可以看出 (1) 我国的经济周期是最为频繁的。1960~1989 年, 中、美、日、韩四国经济周期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7、6、5、4 次, 平均每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也以我国的 4 年为最小, 如果加上 1954~1961 年之间的两个周期, 则我国每个经济周期平均持续的时间还不到 4 年, 而美国 1933~1982 年间的 10 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持续的时间为 60 个月 (5 年); (2) 除经济周期频繁出现以外, 我国每个周期内的波动也是极其剧烈的。1957~1961 年这个周期, 离散系数竟达到 865.62%, 1961~1967 年也高达 144.33%, 1967~1972 年达到 125.19%。由于周期内剧烈的波动, 使得 1960~1989 年整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极为不稳定, 其离散系数高达 169.15%, 是美国的 2 倍多, 日本的 3 倍, 韩国的 4 倍; (3) 此外, 我国的经济周期运动在相邻周期的交替中也是最不稳定的, 最大扩张波幅达到 25.8%, 是美国的 4 倍多, 日本的 6 倍多, 韩国的 2 倍多, 最大

收缩波幅达-28.3%，是美国的5倍多，日本的3倍多，韩国的近3倍，这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周期转换是相当突然的。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运动的稳定性有了根本性的好转，1976~1981年这个周期，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7%，离散系数仅为32.47%，1981~1986年这一周期，经济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0.6%，而离散系数却只有23.87%，这充分说明“六五”时期国民经济真正实现了高速增长，整个1979~1993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9.2%，离散系数为38.64%。尤其是1979~1985年的经济运动形态，基本达到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水平（60年代，日本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1.2%，离散系数为24.18%。）在一定程度上超过韩国70、80年代的运动水平（韩国70、80年代的GD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7%和9.8%，离散系数分别为27.63%和28.11%）。

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虚拟化现象又重新抬头，经济运动的非稳定性又有加剧的迹象，1986~1989年这一周期的离散系数达到40.42%，是1981~1986年同期23.87%的1.7倍。可以预计，现在正处的经济周期的非稳定性比1986~1989年周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正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危险信号，通货膨胀问题已向我们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将高速度作为最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指导思想到此应该休矣，我们过去的教训够沉痛的了，切忌犯同一种错误。

改革至今，市场经济的作用明显增强，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是，引起增长速度虚拟化的

主要因素并没有被消除。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仍还不是真正独立的利益主体，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行为也未发生本质性变化。在这种双轨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要政府有追求高速度的冲动，企业行为就会出现复归，从而国民经济增长仍将表现为“速度型”而非“效率型”，经济增长速度虚拟化又将不可避免。有关这一点只要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与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差强人意”的现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维持往高速度，而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加速市场经济的形成。只有企业在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的情况下，“速度型”经济增长才能转变成“效率型”经济增长，虚拟化现象才可能被消除，否则，我们只能获得一个“画饼”。

注释：

①在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中，由于缺乏改革开放以前的GDP与GNP资料，本文特选择国民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

②令 α 为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β 为人口自然增长率， γ 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作为衡量居民实际生活状况变动的指标）。则有： $\gamma = \frac{\alpha - \beta}{1 + \beta}$ ，由此式可得

当 $\alpha > \beta$ 时， $\gamma > 0$ 说明实际生活水平有提高

当 $\alpha = \beta$ 时， $\gamma = 0$ 说明实际生活水平不变；当 $\alpha < \beta$ 时， $\gamma < 0$ ，说明实际生活水平降低。

③这里所说的市场并非真正意义的上的市场，而是指产品最终由生产者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至于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在此不讨论。

（责任编辑 程镇岳）